

路兮

维 一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路 爷

维 一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3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路爷/维一著.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4

ISBN 7-5006-5515-0

I. 路... II. 维...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061 号

*

中国青年出版社 出版 发行

社址: 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 100708

网址: 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 (010) 84035821 邮购部电话: (010) 64049424

保定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1/32 9.25 印张 170 千字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定价: 15.00 元

本图书如有任何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处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 64033570

雄狮书店: (010) 84039659

写在前边

文集《路爷》和年前出版的《旧时宣武门前燕》一样，说的仍然是如今在海外忆想当年京城里的旧事。按说，写作的缘由已经在前一本集子里面交待过了，这里又来一篇《写在前边》似乎多余。

然而也还可以说出个把理由。

一位读过前本集子的读者大约是看穿了我怀旧的情绪，认准我肯定还有尚未宣泄的往事要说，迟早总会行诸笔端，于是他向我建议，时下的世风是连风味小吃和文房四宝都要讲究系列产品，因此我的第二本集子不妨也选定一个系列的标题，一来以求连贯统一，二来也算是顺应时势。

不过我想，主意虽好，但为时已晚。既然第一本集子没有称为“之一”，何来本集按了排行称为“之二”？

记得幼时母亲带我出门，碰到有父母那一辈尚不十分熟识的朋友，他们一般总会顺口向母亲问起：“这是你家的老几？”意思是指我在家里孩子中间的排行。

当年无论什么都是提倡多多益善，炼钢要一千零七十万吨，种地要亩产万斤，生儿育女也是越多越好。不识时务的马

寅初老先生刚刚插了一句嘴，立刻就被劈头盖脸地骂了一通，搞得人家灰头土脸。

可惜的是，母亲或许是感到养儿的不易，或许也是恐怕世道的艰辛，总之是响应政府号召不力，只生了我一个。不过母亲倒是十分坦然，遇到这种场合，她便会半开玩笑，半为解嘲地回答道：“他是老大，也是老二，还是老三……”由此看来，如果家中只有一个孩子，便用不到排行。

年前，我将上一本集子的书稿交给出版社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会有意犹未尽的话要说，所以只是选个书题，既是“之一”，也是“之二”，还是“之三”。

我的想法是，就像是生孩子，早先讲究的是多子多福，如今号召节制生育；写文章也如是，过去标榜著作等身，现在应该提倡少写。道理其实不言自明：从前识字的人不多，为了传播文化，有能者多劳的意思。可是如今社会昌明，识字的人早已遍地皆是，倘若大家都来写，且不说著作等身，只消一人一本书，那全国十几亿人就会让印刷厂日夜开足马力也难以应付。

后来还是听从了一位社会学家多少有些道理的分析我才转了念头。他认为，社会的人口不能忽多忽少，而且人口性别和年龄的比例都需要一个渐进而合理的组成才最为理想，否则会发生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

写文章也是如此。他认为，我们这辈人留给后世的记录太少，仅仅过去十几年、数十年前的旧事如今已经是鲁鱼亥豕，张冠李戴了。如果我们留下空白，那么只好听凭后世取巧善辩的人信口雌黄。

为了怀旧，信手留下一些文字，倘若因此还能够多少平衡

一些由于时代动荡而造成文字记录的比例失调,那么也确实值得一做。既是这样,我便重新打点起精神,把行将停下来的笔再次转动起来,于是又得到以下的二十余篇。

不过集子终于没有如同家中的孩子一般排成“之一”、“之二”。按说倒也不坏,原先在京城里讲究的是论资排辈,如今到了海外,这些规矩还是能免则免了吧。

其实,文如其人,既然是出自同一人的手笔,内容尽管不同,体裁到底相近,就像自己的孩子,尽管没有排行,总归是丢不掉的。

维一

二零零二年十一月五日于波士顿市郊寓所二闲堂

(电子邮箱:weiyi@edubridge.com)

目 录

路 爷	1
-----	---

老沈的机会	17
-------	----

罗 姨	31
-----	----

罗 叔	45
-----	----

前后《点绛唇》	57
---------	----

樊洋人	75
-----	----

剃头铺的老侯	87
--------	----

白糖与桂皮	96
-------	----

北京的乡下	104
-------	-----

二妈做鞋	115
------	-----

苏联印象	124
却有闲情念小童	132
奥米茄二三事	148
废除高考制度的旧事重提	156
蓝月与黄历	167
红色莎乐美以后的故事	179
忆顾洪大姐	195
帘卷西风	209
这次第,怎一个“拆”字了得	222
茵梦湖寻梦	236
过圣加伦有感	244
没有收尾的故事	257
“内部电影”	269
洞在清溪何处边	279

路 爷

如果按族里的辈分大排行，他应该算是我的七叔公。我的父母当面都管他叫“巴叔”，其实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不了两岁。先前不明白为什么我叫他“七”叔公，而父母他们却叫他“八”叔，后来才知道，原来这是取他别号里面的“巴”字作为称呼，叫“巴叔”，并非是“七八”的“八”。

可是在他背后，我们这些小一辈的都叫他“路爷”，有时他听见了也不以为忤，反而笑着说，“这些小鬼，是从哪里听来的？你们知道其中的典故么？”

我当然知道，因为他叫“路易十四”，所以才尊称他“路爷”。

不过我们整个大家族都是纯粹的中国血统，和法国的波旁王族丝毫不沾边，路爷既不是那个“朕即国家”的法国国王，也不是让大仲马在小说里面糟改过的“铁面人”。

“路易十四”是七叔公的外号。他倒还真是到法国留过学，而且还由此得了这个背负一辈子的名号“路易十四”，所以也才被我们做小一辈的叫做路爷。直到今天，我只知道路爷在族里排行第七，但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的名字，反倒是他的“路易十四”大名让我牢记不忘。

提起路爷到法国的留学还真是说来话长，路爷的父亲四曾祖就是家族里留学的先驱。四曾祖当然也是长沙人，年轻的时候，他听说前清大学士李鸿藻的五公子李石曾先生从法国回到老家直隶的高阳县，办起了“勤工俭学”的留法预备班，湖南的多少青年才俊都涌了去。于是他也就动了心思，没有和家里人打过一句商量就跑到那里报了名。据说后来四曾祖才知道，请的教员原来都是在法国巴黎开中国豆腐坊的老板和伙计，到法国也是去干活，其实学不到什么真本事。四曾祖在家乡好歹是个少爷，听到这个底细心里就不免有些后悔，可是他像所有血气方刚的湖南汉子一样，犟得像头骡子，心里嘀咕，嘴上从来不软。

后来四曾祖果然跟着大家去了一趟法国，还真的到中国人在巴黎开的豆腐坊里干了一气，有的时候也高谈阔论一番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又学了两句回到家乡谁都听不懂的法国话，就从马赛坐船回到了中国。尽管如此，放洋归来的四曾祖还是被众人拥为大知识分子和革命元老，他也半推半就地当上了省党部里支干薪的委员。据说后来族里四曾祖那一支的发达显要，靠的全是他老人家当年到法国走了那一遭。

因为服膺李石曾先生的道德文章，也就追随李先生的政治主张，另外四曾祖大约是十分体会国人崇尚外洋的心境，所以在抗战眼看就要胜利的时候，坚持把他的爱子路爷也送到法国去读书。其实在那个时候，法国的情况还很糟糕，四曾祖母听说之后哭得死去活来，但四曾祖并不为之所动，坚持让路爷从昆明下安南，从河内转道去海防上船，循着当年他的航程到法国去。

路爷从来无可无不可，既然他父亲让他去法国，那他就去法国，心里倒也不害怕。只是在家里娇宠惯了，吃不了那许多苦。虽说家里给他的盘缠不算太少，但路爷嘴馋得厉害，尤其到了“饕餮的巴黎”，什么都想尝，什么都想吃，多少钱也经不住他的折腾。再说，因为战时交通阻隔，家里的汇款也不是都能按时寄到，所以路爷不免总有囊中羞涩的时候。



河北保定市金台驿街五十一号，育德中学旧址——“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当年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发祥地实际在高阳县的布里村，其后不久，在保定育德中学又成立了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二零零二年七月，承蒙当地友人热情接待，我们参观了这里的展览。

可是呆人有呆福气,后来居然让路爷在餐馆里找到了一份意想不到的好活计。

据说洋人最怕“十三”这个数目字,认为凡事碰到这个数字最不吉利。所以大楼里面过了十二层就称十四层,要是有十三层也大多盖得矮矮的,只是用来堆放杂物。医院里的十三号病房也大多作为存放死尸的太平间。而在请客吃饭的时候,有时计划不周,恰巧凑成十三个人,不但会教人扫兴,忌讳多的人甚至还会拂袖而去。不过,倒是也还有变通的法子,餐馆的老板这时候就会招呼临时雇来的人,衣衫笔挺地立刻凑上前去,施施然地在桌边坐下,把人数变成十四个,于是皆大欢喜。请客的主人也并不会为平添的这个人吃喝破费,而是由餐馆来负担。这种特殊的临时工,餐馆也叫不出个什么合适的职务头衔,久而久之,不知是经什么高人点拨,这项化腐朽为神奇的临时工作就被打趣地称为“路易十四”。

当然,这类工作一定要选择长相端正,仪表堂堂的人物。路爷年轻的时候绝对是斯文有加,风度翩翩,自然是饭店老板青睐的人选。

不过,家里人其实谁都没有和路爷一起到法国留过学,这全是路爷他自己说出来的。而且如今我在国外也算走了不少的地方,法国也不是没有到过,但还从来没有听说过餐馆里有这么一桩差事,否则我想,像我们这种在“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里曾经饿得五劳七伤的中国留学生去餐馆应征“路易十四”的一定不少,倘若有这等体面的工作,又何必去做刷碗端盘子的苦差事呢。不过家里人都相信路爷所说的,试想,若不是确有其事,谁会不提自己在国外过五关、斩六将的风光,却把自

己走麦城的“路易十四”放到嘴边来回说？尤其是多少年之后，当我们这一辈人里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放弃国外优渥生活，拒绝高薪聘请，毅然回国”的留洋学子，我就更加相信路爷的话，而且钦佩路爷潇洒不羁的人生态度。

路爷是刚解放不久回的中国，这还是他在联大读书时候的好朋友再三再四地催他回来的。据说那个同学在刚成立的同学会里工作，专门负责联系在海外的留学生，动员他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原先路爷在巴黎已经住了好些年，研究的是谁都说不清楚的美学，据说还专精菲舍尔和李普斯那一派的学问，特别钻研些“物我同一”、“主客体之间的心理距离”这一类很少有人饥肠如鼓的时候想得起来的理论。战后法国经济也不景气，路爷的这类学问一直不好施展，再说四曾祖的年纪也大了，路爷从来是个随遇而安的人，既然还有人稀罕他的人材难得，回去就回去吧，于是也就顺水推舟地响应了号召，而且还顶着个“毅然回国”的高帽子。回国之后到对外友协上班那天的欢迎晚会上，路爷还让两个梳了大长辫子，一身列宁装的女青年献了花。

路爷后来结了婚，“路奶”（尊了辈分其实我应该叫她七叔婆，但后来都背后叫她“路奶”）人也长得十分漂亮，据说就是当年上台给他献花的两个女青年之一。不久路奶还给路爷生了个儿子，他的儿子的辈分当然比我高，但年纪和我相仿佛，也还算玩得来，我们当面就管路爷的独生儿子叫“路易十五”。路爷有时听见了并不恼，还笑着说，你们大家要小心侍候他，千万不要怠慢法国皇帝哟。

不过等我终于明白“路易十四”掌故的时候，已经是路爷被

打成右派，“劳改”回来以后的事情了，路奶也已经和路爷离了婚，改了嫁，把“路易十五”也带走了。那时候路爷看着比先前老了许多，显得弱不禁风的。劳改农场的伙食肯定不好，这我当然知道，那也是没办法的事，可路爷在农场还得了个怪病，却把他折腾得惨了。

那是从路爷到农场以后不久开始犯的病，每逢报纸上一提搞运动，他就发起高烧不退，而且无论什么盘尼西林、普鲁卡因，打针吃药全都不管用。好几回都报了病危，可路爷家里已经没了人，只好独自躺在床上等死。

就这样闹了三四次之后，据说有一回，分派在病房里等着路爷最后咽气的一位劳改犯，看着奄奄一息的路爷，大约也是兔死狐悲的缘故吧，趁暗地里没人的时候骂了一句：“搞你他妈的运动！”

谁知随着他的话就出现了奇迹，路爷居然很快退了烧，也能进食了，然后就能下地活动了。

得亏这个劳改犯留了个心眼儿，路爷后来又发作了一两次，经他一骂，竟妙口回春，屡试不爽。当然，这个劳改犯并不敢把实情告诉带队的管教，只是每次路爷被送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就自告奋勇地说他有办法，但是必须让他单独和路爷呆在一间屋子里，而且还得门窗紧闭才成。领导上开始也是将信将疑，可路爷果真让他给治好了，也不由得不信。领导看他有这么一手绝活，就特意把他调到农场医院，可是别人的病他全治不好，后来因为困难时期农场劳改犯死得太多，就把他分配在太平间里抬死人。

这一去就是三年，路爷回来之后，发配到西城区的一所中

学教劳动课,其实就是在校办工厂里带着学生锯钢筋,绞钢丝。工资也减了一多半,好在路奶带着儿子走了,家里就路爷一个人,自己吃饱了全家不饿。只是路爷释放回家以后像是换了一个人,从此性情大变,一改往日的倜傥作派,终日闷闷不语。有时我下学路过府右街,偶尔去胡同拐角的大杂院里墙头杵的那间小屋去看他,街坊四邻全都没有个好脸色。路爷见了我没有什么话说,有时候连杯水也不给倒,还得我自己动手。要不顶多就瓮声瓮气地问我家里人是否还好,最后就催着我快点儿回家,还说以后如果没有什么大事就不用老来了。

从此我和路爷的过从越来越少。除了逢年过节,我的父母看在做晚辈的分上,邀他出来到西单路北的湖南馆子曲园吃顿家乡饭,或者湖南老家来了人,一定要我带路去看望他,否则虽然都住在京城里,一年半载的我也难得见上路爷一面。

等我长大了许多,也明白了一些世事,家里人就讲给我听路爷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经过。其实那还是“反右”斗争前两年的事,有次小组开会学习,有人偶然提起当时一位有名的美学权威,说他在某篇评论上劈头就是这么一句:“我们为什么说五星红旗是美的?”

路爷好像是看出点儿破绽,随口就答道,命题开头就用这样的问句发语,逻辑上似乎有些不妥,其实我们不妨首先论证五星红旗是不是美,然后再进一步阐述五星红旗为什么美。

“好哇!你居然对五星红旗是不是美的都发生疑问啦,这还了得么!”这是批判会上众口一词的责问。其实当时路爷说这话的时候并没有人吱声,可是到了反右运动,这就成了大问题,尤其自从上级下达了右派人数的规定指标之后,路爷正好

成了众人把他抛出来,以便各自逃命的垫脚石。

当时路爷倒还心不在焉,开大会宣布“劳改”名单的时候,他听见台上喊到自己的名字,站起来跟着右派队伍就走了。可是到了农场干活,他才觉出那活儿实在太累,他干不了,后来又得了那个怪病,一来二去的就把身子给弄坏了。

听了路爷的遭遇,我也开始留神和别人说话的分寸了,可是从小养成的毛病恐怕不一定好改。

到了“文化革命”,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路爷必是首当其冲。母亲放心不下,就差我出去打听路爷的境况。我不敢到路爷家,怕碰上抄家的红卫兵,也不好到路爷他们学校直接去问,那样太显眼。好在我有一个同学,他的母亲正巧在路爷他们的中学当老师,我便跑到他家去打听。

人家倒还安慰我,说是路爷并不打紧,只是他神经太紧张,还闹出过一场笑话。那是前些天学校里造反派开大会,要揪出“走资派”,可又不明说,只在麦克风里大打心理战:“我们早已掌握了充分证据,如果负隅顽抗,你只有死路一条!”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敌人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就在革命群众震天的喊声里,只见路爷一路小跑地从操场后边直奔到主席台前,口中声嘶力竭地高叫:“赶快把我揪出来吧,赶快把我揪出来吧!这么熬着我,可真是让人受不了啦!”

可是并没有人要“揪”路爷,因为路爷是“死老虎”,人家要抓的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路爷离那个标准太远。当然,会后还是免不了给路爷头上浇一桶糨糊,用墨汁涂个黑脸蛋,再押在黑帮队伍最后面绕着操场游了一回街。

众人背后都笑话路爷经不起事。可我知道,他没有再发高烧已经是很不错的了。

幸亏还是批判《海瑞罢官》的时候,我的父母知道路爷有个一来政治运动就高烧不退的老毛病,早早就打发我到路爷家,趁他躺在床上刚刚发作的工夫就咬牙切齿地破口大骂了运动一番。如今或许是免疫功能发生了作用,路爷居然没有发病,总算撑了过来。其实这个偏方还是那位专治路爷绝症的劳改犯释放回家以后,打听到我们家和路爷是亲戚,特意上门来教授的,说是还不能让路爷知道其中的原委,否则就不灵了。

“文化革命”里头大家都是自顾不暇,我也就好久没有去看望路爷。记得几年之后的一个晚上,我偶然去看路爷,这才知道他平素是怎么自己吓唬自己的。

路爷的小屋只有一扇窗,窗帘就靠一根锈了的铁丝吊着。到了掌灯时分,院子里的街道积极分子老是在窗前晃来晃去,我不愿意让他们知道我在路爷这里还没有走,于是就想着将窗帘拉上。窗帘的吊环大约是太旧了,扯也扯不动。于是我就用力地来回扯了两遍,可越扯越是扯不动。

“不要来回拉窗帘!”原来低头不语的路爷小声地吼了起来,平素漠然的脸上突然透出一股极为恐惧的表情,着实吓了我一跳。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路爷发过这样大的脾气,一时竟被他吓住了,手也就停在半空中。

“嗨,既然拉了半截,就全拉上吧!”路爷拖长了声音对我说,停了半晌,又埋怨道,“我是说,窗帘不能来回拉,要不人家还以为我是在向特务发信号呢!”

我心中这才释然,连忙说:“哪儿能够呢。就这么几下,窗